

事迹 与 心迹

余斌

著

鲁迅与广告

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

《十八春》的雅与俗

《诗人》郭沫若

林语堂的一和、戒、来、除

西南联大、大迎阳、鹿桥

初期白话文

序跋之英

同人杂志

几则书刊广告

作家与出版家

田武雄、靳武候、赵新武供

非外借



事迹 与 心迹

余斌 著

鲁迅与广告

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

《十八春》的雅与俗

《诗人》——邵洵美

林语堂的《加、减、乘、除》

西南联大·大观园·鹿桥

初期白话文

序跋之类

同人杂志

几则书刊广告

作家与出版家

旧武汉·新武汉·超新武汉



Copyright 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事迹与心迹 / 余斌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9.1

ISBN 978-7-108-05895-9

I. ①事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240 号

选题策划 知行文化

责任编辑 马 翀

装帧设计 刘 洋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15.75

字 数 181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4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目 录

- 1 / 鲁迅与广告
- 5 / 鲁迅的书账
- 7 / “同路人”茅盾
- 13 / 茅盾小说中的性描写
- 19 / 茅盾与莫泊桑
- 27 / 《十八春》的雅与俗
- 37 / 张爱玲与林语堂
- 45 / “白话邪宗”
- 55 / 姚颖与《京话》
- 61 / 徐讦与他的现代鬼故事
- 71 / “诗人”邵洵美
- 77 / 《续结婚十年》“索隐”
- 85 / 石挥的小说
- 91 / 林语堂的“加、减、乘、除”
- 101 / “妾身未分明”
- 105 / 《大地》风波
- 115 / 西南联大·大观园·鹿桥
- 123 / 《未央歌》与古典小说的文人传统
- 129 / 初期白话文

135 /	传记文学的两途
143 /	序跋之类
147 /	从“新格拉布街”想到“亭子间”
153 /	“三底门答尔”
159 /	劳动者的形象
165 /	记忆的修正
173 /	没“戏”
177 /	一九三七年的爱情
187 /	同人杂志
193 /	几则书刊广告
199 /	作家与出版家
205 /	不完整的书
209 /	社会小说的“作法”
215 /	尊卑有序
223 /	通俗作家的自卑心态
231 /	雅俗之间
235 /	旧武侠·新武侠·超新武侠
245 /	后 记

鲁迅与广告

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，甚或有几分褻渎，因为人们对广告多的是厌烦，少的是好感。都说现今是信息时代，而最富侵略性的信息，恐怕首推广告，因为它无孔不入、无处不在，而那内容又皆咄咄逼人，足以“振聋发聩”，或是极尽挑逗之能事，隐然有你若不受招徕便要追悔终身之意。以我们对广告如此恶劣的印象，实在难以想象鲁迅与广告会有何瓜葛。

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，《鲁迅全集》中收录的就不下数十条，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、据实道来的。

登在《京报副刊》上的《苦闷的象征》广告文曰：“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，共分四章。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。并无删节，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。印成一本，插图五幅，实价五角。鲁迅告白。”这里毫无渲染，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，“其实”二字下得尤妙，犹云：“书中并无‘性苦闷’之类，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。”搁在今日某些书商、出版社手里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，做此声明，岂非自断财路？

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《红牡丹》一书做个对照，那

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“性的冲动，情的需求，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”。这已是堕入地道的“瞒与骗”了，我们通常所见的广告虽不致如此，然而夸大其词却是不免的，而说大话、唱高调，里面有意无意间实在也就含了“瞒与骗”的成分。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，反对假大空，此种精神甚至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。最好的例子是他为《莽原》重拟广告一事。

1925年，《京报》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《莽原》周刊，随《京报》附送。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：“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：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？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《××》周刊，详情明日宣布。本社特白。”头一句即拉开架式，先声夺人；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，后面隐去刊名，则是故弄玄虚，设置悬念——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，似乎也并无大错。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，斥为“夸大可笑”，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，并“硬令登载”，且“不许改动”。于是第二天的《京报》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，云新出周刊一种，“是为《莽原》。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，文字则或撰述，或翻译，或稗贩，或窃取，来日之事，无从预知。但总期率性而言，凭心立论，忠于现世，望彼将来云。鲁迅先生编辑，于本星期五出版。”——恳挚实在，诙谐风趣，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成趣。

但是事情还没完。邵飘萍虽因“硬令”，只好刊出，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，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“无聊的案语”曰：“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，因系原样，本报记者不便僭易，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。”鲁迅看了哭笑不得，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：“做事遇着隔膜者，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。”

鲁迅多半是要碰头的，因为他与“广告界”的精神实在大异其趣。广告的本意大约不过是广而告之，据此，广告的要求应是准确地传递出某种信息，而商家做广告意不在此，要的是“轰动效应”，是轰动带来的经济效益。依照前者，鲁迅的广告可得满分，依照后者，则恐怕要判不及格了。

当然，鲁迅的广告还不止于据实相告，字里行间有调侃，有讥嘲，诸如“或稗贩，或窃取，来日之事，无从预知”之类的“滑稽”语，并非有意滑稽，亦非刻意摆出低姿态，而是暗有所指，比如这里就是和夸饰的作风唱对台戏，给邵飘萍们一点难看（邵飘萍应是同一战壕中人，后以“宣传赤化”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，但以其趣味而言，实与鲁迅相去太远）。这就传出广告以外的信息了。难怪未与鲁迅反目之前的高长虹，看了未名社出版物后面的广告后，道是“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，这里的广告却像是批评”，赞其“别开生面”了。所谓批评像广告，乃是那时的评论与今日的情形相仿佛，多有标榜吹捧之嫌；至于广告像批评，看鲁迅拟的广告便知。

我估猜高长虹看到的是一则题作“《未名丛刊》是什么，要怎样？”的广告。里面如此这般地写道：

所谓《未名丛刊》者，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，乃是还未想定题目，然而这就作为名字，不再去苦想它了。

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，凡国民非看不可。只要有稿子，有印费，便即付印，想使萧索的读者、作者、译者，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。……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。所愿的：无非（1）在自己，

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；（2）对于读者，是希望看了之后，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。

写这广告时以鲁迅与胡适为首的一群名流学者已然分道扬镳，胡适等人开国学书目、青年必读书，已被目为或是自许为青年导师。明乎此，则所谓“学者们精选的宝书”“国民非看不可”之类的反语，其批评锋芒指向何处，自是一目了然。

鲁迅确实是一位斗士、一个性格鲜明的人，他在回忆性的散文中固然时而借题发挥，对目下的人事旁敲侧击，甚至在广告中亦表达出自己的好恶，不忘对“学者们”“好的世界”施以一击。现代著名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办书店、编刊物、出书，都曾写过广告，如茅盾、林语堂、叶圣陶等。因是文人，笔下自然另成一格，与寻常广告大异其趣。不过鲁迅仍旧显得特别，不必问谁是作者，单看这峭拔的文风，看看里面的反语我们便知道，是鲁迅的手笔无疑了。

鲁迅的书账

鲁迅的论敌常对他有些恶形恶状的描绘，有夸张他被香烟熏黄的牙齿的，有想象他的“醉眼蒙眬”的，又是烟，又是酒，撇开背景不论，单从这些字面上去看，鲁迅倒真像是“失意文人”，或是像个名士了。实则鲁迅最是个认真不苟的人，即在生活小节上也绝无文人习气。常到鲁迅家走动的郁达夫发现他的书房里总是整整齐齐，书案上亦井然有序，且一尘不染。这真让郁达夫这个地道的名士派大为讶异了，因为他所知道的一些文人，书房总是凌乱不堪的。鲁迅的不苟从他的日记上也可见出。他的日记并不像今日某出版社推出的《名人日记》之类，里面到处是“思想火花”和滔滔议论，而是地道的流水账，简而又简，但他每日必记，从1913年起，到1936年去世，几乎没有一天落下。偶尔有几天漏记，也必要说明“失记”。既是仅限于记事，有时无事可记，记什么呢？记得最简的是只有天气，阴晴雨雪。我有位同窗曾细读鲁迅日记，告我他发现日记中常见“濯足”“夜濯足”字样，而且有好多日日记里只有这两三字。回想一下，恍惚也有这样的记忆。这当然不是“濯足长江万里流”的濯足，不过是在脚盆里洗脚罢了。想来鲁迅每日伏案到深夜，脚已冰凉，暖水温泡，甚是惬意，故而常有此一记吧？据此也可推知鲁迅的日记多是次日记的，濯足完毕当从

速就寝，不见得再去握管了。

不过鲁迅日记里记得最认真详尽、最清楚明白，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还要算他的书账。鲁迅有一习惯，每购一书，不仅在那一日记下书名，而且也记下书价，巨细无遗，毫厘不爽。比如《仇十洲麻姑仙图》等图，每枚价仅八分，也都一一记录在案。1913年5月买的一册《观无量寿佛经图赞》所记价为0.312元，更是精确到厘了（可知那时买书的讲价是极细的，但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法）。每年岁末，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账，将所置书籍、图册、拓片等按购置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，月为单位是小结，最后算清一年共花费几何，此外又还常算出平均每月花去多少。

鲁迅自奉甚俭，衣的朴素随便是不用说了，吃住行也都很简单，唯在买书上手脚是大的。平均下来，每年所费在500元以上。到上海以后，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，做长久计了，书买得尤多，一年常在800元以上。最多的1930年，总共花去2404元，平均每月约200元，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几个月的薪水。而到去世为止的20多年间，鲁迅的书账加起来将近13000元，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也够了。鲁迅的收入不能算少，然要买这么多的书，总也感到吃力了。1912年书账的后面有一段附记道：“审自五月至年莫，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，然无善本。京师视古籍为古董，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，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，尚复月掷二十余金，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，亦可笑叹人也。”看来读书人买不起书，买得起书的人不读书的情形并不限于今日，然鲁迅不能“致之”的是古籍、善本，今日的读书人则在书店里面对着寻常的新书也不免有阮囊羞涩之感，只有流连忘返，不能满载而归了。

“同路人”茅盾

很久以前在《文汇月刊》上读到过丁玲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，文章写到瞿与她的好友王剑虹之间的恋爱，上海大学的情形，激进青年生活的种种，依稀传递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革命罗曼蒂克的氛围。其中也提到了茅盾，虽只是顺笔带到，三言两语，我却至今还有些记得。其时茅盾在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，瞿秋白则是社会学系的主任，丁玲记述她做学生时对二位印象，大意谓瞿秋白风趣平易，与青年学生融洽无间；茅盾相较之下则显得矜持，师生之界是有的，说望之俨然也许稍过，总之是更像学者、教授吧。这恐怕很可以代表一般激进文学青年心目中茅盾的形象。并非是个人性情的品鉴（时代青年很少有这样的余裕），其中实在隐含着某种政治的评判和与此相关的情感态度。

须知学者、教授在社会上或许是受尊敬的人物，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则多少是感到隔膜的。如果说“五四”时期，作为代表“前进知识阶级”的群体，他们为青年所崇仰的话，那么到大革命时代，教授、学者、名人而要能获得革命青年的衷心拥戴，前提倒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像学者、教授或名流。教授、学者体面的社会身份意味

着与既定社会秩序的某种联系，其本身似乎就与“革命者”的概念有着不小的距离（照理说作家也属所谓“知识阶级”，应该一律看待，但或许因为其主体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激进青年，故而作为群体，好像是被另当别论的）。即使倾向革命，教授、学者这些字眼所暗示的稳健、矜持、距离感、个人主义等，也妨碍他们无保留地献身革命。而在患着“小资产阶级狂热病”的激进青年那里，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应是绝对无距离、无保留的。丁玲对茅盾的印象中，有意无意间正包含了这层意思，虽然茅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，而是富于学者气质的作家。大革命失败后，茅盾一度消沉，与中共组织也失去联系，30年代他虽参加左联的工作，并且还是左翼文坛的头面人物，但事实上只被视为同路人。而在这之前，无须什么组织意见，在以革命主人公自居的青年那里，他无形中恐怕就一直被当作同路人看待。

做学生的丁玲不知道，那时的茅盾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革命者，是中共党员。即使知道了，也不见得会全然改变印象，因为他还是有别于那些职业革命家。而在职业革命家眼中，茅盾这样的党员可能只被看作组织的外围，或者也可以称作党内民主人士吧？近读郑超麟《怀旧集》，其中《回忆沈雁冰》一文谈到对茅盾的印象，很有意思，或者也代表了党内（尤其是职业革命家）对茅盾这一类人的看法。

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人，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“少年共产党”（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），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1924年回国，在中央机关从事宣传工作，曾做过瞿秋白的秘书，大革命失败后加入“托派”组织。在法国时，曾琦拉他加入“少年中国学会”，

给他看该组织的会员录，他回忆道：“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‘新思潮’杂志（当是《新青年》之误）上写文章，如李大钊、恽代英、田汉、易家钺、王先祈、毛泽东等。出乎意外地，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……我想，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‘新思潮’方面的，与那些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。”所以感到意外，当是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屡见沈雁冰的文章，《东方杂志》是商务印书馆所办，其不革命自不待言，这上面的名人在他想来与革命者总是两路的。这时的郑超麟尚未入党，应属激进青年，他的诧异感与丁玲对茅盾的最初印象，二者背后的意识，实有相通之处。

郑回国到中央机关工作后，与沈雁冰有较多直接接触。渐渐知道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，有了党的组织就加入了。郑是回国以后入党的，所以论资格，沈雁冰比他老得多。但这并不妨碍他怀有成见，甚或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。文章提到五卅运动中出现的两份杂志，《公理日报》是商务印书馆老板出钱让职工办的，照郑的推断，商务印书馆此举“一来为了表示爱国，二来是为了避免闹工潮”。故不敢畅所欲言乃意料中事。郑振铎是该报主编，沈雁冰无疑也参与其事。瞿秋白以为根本没有所谓“公理”可言，对该报极不满（可能多少也含有对沈的不满），遂创办《热血日报》。有意思的是郑对此事的议论：他承认《公理日报》因其性质所限，沈雁冰作为编辑之一不能扭转局势，“但即使他是主编，《公理日报》也未必能像《热血日报》那样冲锋陷阵。我想，即使把《热血日报》交给沈雁冰主编，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”。言下之意，自然是说沈四平八稳，不够坚定大胆，不够旗帜鲜明。

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，还是下面这段话：“当时，我们做党内工

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，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，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，他会毫不迟疑完成的。沈泽民（茅盾之弟，中共早期党员）也是如此。但1924年秋和1925年春，我们奉命为‘国民议会促进会’和‘追悼孙中山’两个运动上街去演讲和散发传单时，沈泽民还是慷慨激昂的……我则未曾看见沈雁冰有此表现。”

这显然是不大有利的评价。看来那时党内对同志的评价，亦有不成文的标准，要视其是否足够“积极”而定，而“积极”须见于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，见于激烈的态度，尤见于群众斗争一类实际活动中之“风口浪尖”的表现，而不限于主义的坚执和完成派给的“任务”。像茅盾这样保持着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，只能被视为消极了。组织安排给他的工作，在“做党内工作的人”的眼中，也许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吧？从郑超麟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疏远，如果“我们”确能代表“党内”，则那时的党内对茅盾的态度可说是尊而不亲，这也正是后来对同路人、对民主人士的态度。

茅盾的独立性（或曰“消极”）尤见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表现。蛰居上海期间，郑有一次去看他，“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农村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”，以为没有出路，“好像秋天的苍蝇，在窗玻璃上乱钻，结果还是钻不出去”。这是郑“第一次从同志口中听到的公然反对党中央所行政策的言论”，吃惊不小，同时对沈的“公然反对”不以为然。他本人对现行政策也有怀疑，“但把反对的思想藏在心里是一回事，把反对的思想公开说出来，又是一回事”。显然，沈的言论如其不被理解为“离心”倾向，至少也被看作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了。郑回忆说，他已想不起来事后是否向党组织汇报了沈的谈话，但他的反应已见出二人对“组织”的不同态度。

有趣的是，这番谈话以及《蚀》三部曲中表露的消极情绪，倒是后来郑以为茅盾可以成为争取对象的一个依据。其时郑追随陈独秀，已成为党内的反对派，正从事“托派”组织的活动。茅盾从日本归国后，郑去找过他，“我是怀抱政治目的的，即是向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”。他没有遇到茅盾。但事后他却悬想：“如果那天我见到他，同他说了话，以后又拿我们的文件给他看，将会产生什么结果。我想至少，他对于中国‘托派’的主张不会那样隔膜吧。”事实是，茅盾已回到中共主流派的立场，在小说《子夜》中，更有对于“托派”观点的批判。只是这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，真正是党的同路人了。至于郑超麟这样的“托派”分子，则被开除出党，视为反革命，后来更被宣布为“汉奸”了。

虽然主张不同，茅盾与“托派”人物的私人关系倒未全然断绝。30年代他替生活书店编《中国的一日》，即转托汪原放请在国民党治下蹲大狱的陈独秀写一篇文章，陈文内容与当时中央的路线有不合处，他照样收入。抗战胜利后郑超麟托人将自己的一部译作送给茅盾，后者亦欣然收下，并且据郑所言，他还在来人面前大谈“托派”和中国共产党的殊途同归。此类举动郑超麟当然是赞赏的，对茅盾看似矛盾的态度，他的解释是：“沈雁冰毕竟不会相信陈独秀、郑超麟，以及中国‘托派’做了汉奸。他毕竟没有那么强的所谓‘党性’。”对于“所谓‘党性’”的鄙薄，或者是由自身经历而来的“伤心悟道”之言，只是不知郑如何协调他对茅盾前后大相径庭的评价：他早先对茅盾的不满，是因为茅盾未表现出坚强的“党性”；后来出于同样的理由，又对他表示赞许。变化的是郑超麟，茅盾则实有他一以贯之的地方的，他始终未全然放弃自我，组织之外，他还以他的方式

坚持一份个人的判断。郑超麟早先的不信任感由此而起，后来之相信茅盾对“托派”必有公允的看法，也是为此。茅盾毕竟是“五四”时代的人物，“五四”过来的人实在是更健全的。至于在一个你死我活、非此即彼的年代，保持着某种个人立场的人是否只能扮演同路人的角色，那又是别一话题了。